



早在1938年就被日军宣布阵亡的王牌飞行员,居然在兰州永昌路上隐身了半世纪?这是真的吗?经过多年追踪,多位文史学者及市民记忆证实似乎确有其事!这个故事要从1938年无锡上空的一次空战说起。

日本王牌飞行员曾在兰州永昌路隐身半个世纪?



老王说陇史



汉代铜量

1 被击落的日军王牌飞行员

这位日军王牌飞行员名叫山下七郎。抗战时,日本海军航空兵有南乡茂章、加藤建夫、山下七郎和潮田良平四大王牌。山下七郎,1907年出生在日本九州福岡,日本海军学校第57期毕业,曾因技术优秀担任试飞员。后来,山下七郎担任日本海军第13航空队大尉分队长,驾驶126号九六式舰载战斗机。

1937年9月中旬,日军大举轰炸南京等地,山下七郎负责掩护日寇轰炸机群。从9月19日起,山下七郎频繁出动。他们遭到了中国空军的全力阻击。9月26日,山下七郎在苏州附近空战中被中国空军飞行员罗英德击中。山下七郎迫降在太仓双凤的一片坟地里,最终被当地民众生擒。

失去踪迹的山下七郎,成为日军讳莫如深的事件。在那个年月,一位天王级王牌飞行员被击落,对日军的士气打击是非常的大。直到1944年日军才把山下七郎从飞行员名单中除去,计入阵亡人员。但并没有像一般日军军官,在确认战死后,将军衔特进一级。山下七郎依旧是大尉。可见,关于山下七郎的去向是疑点重重。

半个世纪后的2003年,在日本国内流传着这样一条新闻,说二战中日本四大王牌飞行员,并没有全部阵亡,还有一人幸存。这位幸存者就是山下七郎,



日本图书中的山下七郎(右)

山下七郎驾驶的南京大校场机场旁坠落的轰炸机

中国飞行员罗英德

图片来源于网络

更为惊奇的是,他居然死在了中国的兰州。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击落后被俘的山下七郎,一直在辗转关押中。后来,在击落他的中国飞行员罗英德(他还击落另外两个日军王牌飞行员)的介绍下,山下七郎开始为中国空军服务了。此时,他不仅取了中文名字,也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山下七郎这个名字就消失了。

1948年,罗英德和山下七郎在西安相见。山下七郎说,他决定到兰州定居。因为他太太是兰州人。他们已经联系了兰州一所乡村中学,他在那里可以教英文、数学、理化,孩子们也可以免费上学。罗英德为此写了一首诗,题目是《送山下君之兰

州》。

2 兰州永昌路曾有一家日本人

此后,山下七郎就彻底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了,直到2003年,日本传出有关他的消息。2020年,著名党史专家袁志学,发布了一篇文章《日军王牌飞行员山下七郎曾经隐身兰州?》叙述了前因后果。袁志学在文章中如此叙述:

“此后,我多方动员人们寻找相关线索,可惜没有进展。数月前,在我家的故纸堆里,找到2000年初,我省著名文化人岳逢春写的文章《四大名人》。文章中,岳逢春回忆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兰州的四大名人的故事。

这四大名人是疙瘩老汉、玛露茜、嘎刺儿、东北傻子。”

其中在玛露茜一节中,他提到永昌路上,有家日本人。

“在永昌路上,除了玛露茜之外,还有一家俄国人和一家日本人。那日本人经常在马路边上,将他的一辆红色摩托车拆开擦洗,引得不少孩子围着看新鲜。日本人的老婆对孩子们很和蔼,常常提醒别弄脏了衣裳。我们明明知道这家人是日本人,却从来也没有把他们与电影上举着战刀的日本鬼子松井大队长联系在一起……”

“后来,岳逢春先生回忆了更多细节:那是1964年前后。当时,我在西北新村小学上学,每天要路过这一段。那家日本大概住在永昌路和白银路的交接处。日本人家男主主人,常穿一件飞行服(飞行夹克),比较喜欢机械。他那辆红色摩托车,让我们记忆非常深刻,因为上世纪六十年代,自行车都比较少,更不要说摩托车了。他们家居然有一辆。你说奇怪不?”

不仅岳先生记得这家日本人,其他一些市民也有相似的回忆。

永昌路上的这家日本人,是否就是隐居兰州的日本王牌飞行员山下七郎一家呢?目前还不确定,但从飞行服和摩托车来看,有着非常大的可能性。

在这里期待着,文史圈的朋友们能够提供有关山下七郎的更多线索,共同揭开这一历史之谜。

掌上兰州·兰州晨报记者 王文元

“永登”这个名字是这样来的

兰州市永登县,许多人已经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但是,许多人不知道的是永登这个名字已经有1700年历史了。

永登地处黄河以西,为通往河西走廊必经之地,在2000多年的岁月中,永登经历了很多的故事。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永登”的来历:

永登的历史非常久远,至少在六七千年前,这块土地上就有人类在生存繁衍。那时,远古先民多选择河谷边向阳的台地上定居。庄浪河、大通河等河谷两岸都曾原始先民的遗址。这些年,人们在永登境内发现了四五十处古遗址,同时出土了陶器等文物,其中的彩陶鼓名动考古界。

公元前121年,霍去病远征河西走廊的匈奴。由此,河西走



汉末三国时期金城郡地图

廊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的版图。汉王朝开始经营河西走廊。为了控制所占据的河西走廊。汉政府开始有计划有目的地往河西走廊迁移人口,设置郡县。武帝元鼎二年(前115年),汉王朝又在今永登县境设令居县。元鼎六年(前111年),汉王朝在河西开设田官,令塞卒戍田,筑令居至酒泉边塞。至此,永登的战略价值凸显。

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

年),汉王朝置金城郡,领属13县,其中在今永登县境内的有浩亶、令居、枝阳、允街4县。这些县,基本上沿着庄浪河谷分布,实际上就是控制今天的庄浪河地区。因为这条河谷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在分割青藏高原的美人和游牧在蒙古高原的匈奴人的同时,也守护着在河西走廊乃至西域驻防的汉军后路,更是盛产粮食的河谷。令居塞也成为当时的一个规模庞大的军事基地,汉军远征蒙古高原匈奴,有时候就是从永登出发的。

东汉末年,曹魏统一中国北方后,仍由金城郡辖,废枝阳县,令居、允街、浩亶3县依旧。西晋末,凉州刺史张寔复设枝阳县,并在建兴四年(316年),分金城之令居、枝阳二县,又立永登县,合三县立广武郡(见《永登县志》)。这是“永登”名称在历

史上首次出现,取永远五谷丰登之意。

可见,“永登”这个名字已经有1700年了。不过,知道它来历的人真不多。元代称庄浪县。明代将庄浪县先后改称庄浪卫和庄浪守御千户所。清雍正初改庄浪卫为平番县。民国十六年(1927年),平番县更名为永登县。

永登物产丰富,地处交通要道,商业繁荣,明代就有茶马交易,清代有“钱平番”之称。各地客商在永登的县城、连城、红城设有会馆,从事百货、棉布、钱庄、茶叶等生意,生意繁荣兴盛。

至今,“永登”一词,已经有1700年的历史了。人们最初取“永登”的目的,应该是盼望结束战乱,恢复大汉王朝时的荣耀,实现五谷丰登。

掌上兰州·兰州晨报记者 王文元

汉代的“公平秤”

转眼就是中秋节。天高气爽,万物收获,辛苦了一年的农人们终于迎来了属于他们的节日。

以前,在农村,中秋前后有个非常重要的活动“上粮”。“上粮”就是给国家上缴粮食。每家每户按照田亩的多少,将规定数量的粮食上交粮管所,以完成自己的纳税任务。

上粮时,有时不用秤的,而是用升、斗之类的量器来盘量。斗是用四块状如梯形的木板拼接而成,上有开口,下有底,为倒梯形形状的器具,平平的一斗小麦是四十斤。

这是一种古老的量器。至少在商鞅变法时期,中华先民们就用这种量器来计算粮食了。上海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商鞅铜方升,长方形,有柄,容积202.15毫升,这就是战国时秦国的1升铜量器。这件铜量还有更神奇的一面:秦始皇一统六国后,将东方六国混乱的度量衡进行了统一。这件商鞅铜方升再次派上用场,秦王朝又专门刻字再次确认。可见,度量衡的统一是大秦帝国的基础和标志。

其实,按照甘肃许多地方的称呼,商鞅方升应该是一种抄子,容量比升要小,专门用来装粮食的。许多超市内装大米时,还用这种抄子。

类似商鞅铜方升的铜量器,甘肃也出土过。甘肃庆阳市博物馆就藏着一件汉代铜量,高11厘米,口径17.6厘米,直壁下微收,底内有汉隶“市平”二字。这种铜量还是成系列的,比如在王莽时期颁发的新量器有斛、斗、升、合、龠五种单位,形状为圆形。由此来看,庆阳的这件铜量很可能是新莽时期的量器。

不论是商鞅铜方升,还是汉代铜量,它们都是政府颁发的标准器具,供各地以此为标准来制作市场上使用的器物。这应该就是汉代粮食市场的“公平秤”。

文图 掌上兰州·兰州晨报记者 王文元